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 History of China

Translation in

中国翻译通史

马祖毅 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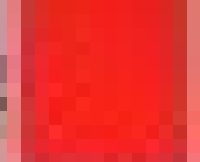
现当代
部分

 China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教育出版社

第一卷

THE GREAT WALL PRESS

A History of



China

TRANSLATED BY

中国翻译通史

THE



现代史学

C

第一卷



目 录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篇	1
第1章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	3
第2章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两大时期	9
第3章 若干马克思主义经典名著的翻译出版情况	42
第4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翻译研究	90
第5章 国外一些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著作的翻译	98
第6章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名著的翻译	116
哲学社会科学的翻译篇	137
第1章 翻译概况	139
第2章 西方哲学	147
第3章 伦理学	227
第4章 逻辑学	252
第5章 政治	266
第6章 法律	287
第7章 西方经济学	325
第8章 管理学	362
第9章 军事	375
第10章 外国史学及历史著作	398

第 11 章	地理	473
第 12 章	教育	485
第 13 章	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著作	507
第 14 章	心理学	555
第 15 章	未来学	583
第 16 章	人口学	602
第 17 章	美学	613
第 18 章	国外文论的引进	641
第 19 章	美术、音乐、舞蹈、电影、建筑	663
第 20 章	语言学	699
第 21 章	宗教	718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篇



第 1 章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中国人对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初接触,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时,张德彝作为清政府赴法使团的译员适在法国,他在《三述奇》(《随使法国记》)里,用了很大的篇幅记载了耳闻目睹的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的事实。如1871年4月15日记云:

申初,又由楼下解叛勇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

又16日记云:

晚,又解过叛勇二千五百余人,有吸烟者、有唱曲者,盖虽被擒,以示无忧无虑也。

张氏虽目巴黎公社战士为“叛勇”,但仍忠实地描绘了战士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

王韬则根据香港《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关于巴黎公社的报道,汇编《普法战纪》,于1873年出版。较之张德彝的日记,流传更广。

江南制造局于1873—1882年编译出版的不定期刊物《西国近事汇编》也多次报道过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党的活动。当时把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党译为“莎舍尔德玛喀”或“康密尼党”、“康密尼人”,把社会主义译为“贫富适均”、“贫富均产之说”或“廓密尼士”。

据美国学者伯纳尔《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丘权政、符致兴译)一书所述,我们应把中国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的时间上提至1898年。伯纳尔说:

《万国公报》的编者经常超出自己的信仰,倾向较为激进的思想。1898年夏,他们在中国出版了第一部系统讲解多种社会主义的著作。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现代部分·第一卷

该书乃英国柯卡普(Kirkup)《社会主义史》(*The History of Socialism*)的中译本。胡貽谷(一作胡颐谷)应李提摩太之约译出,1898年交广学会出版,书名《泰西民法志》,初版印数甚少,1912年再版。兹从再版本引出关于马克思的一段如下:

民法志中之俊爽豪迈,声施烂然者,莫马格司(马克思)若也。有志同道合之恩吉尔(恩格斯),共倡定律与革命二义,势力最伟,学说也锋厉无前。凡国人之以文明称者,莫不奉为矩矱。

作者接着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作了详尽的评述。1920年,又出现了该书的另一译本,是李懋庸根据普拉斯(Prase)1913年的增订本翻译的。蔡元培在该译本的序言中未曾提及《泰西民法志》,看来他并不知这一译本的存在。由于这两个译本源于同一本书的两个版本,而两个版本在内容和体例上有所差异,因此难以分辨。所幸者,普拉斯在序言中有说明,可以作为佐证。普拉斯说:从第1到第9章保存着原书的内容,没有变动;第10、11两章则加入了1892年以后的内容;第12、13、14章则合而为一。谈及马克思的部分,在第9章中,现引出一段,可与《泰西民法志》中所述作一比较: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思(恩格斯)都被大家认为“科学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一派在文明各国中都有代表,而大家对于这一派认为是社会主义中最可怕的新派。

1899年2月,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册上刊载了一篇名为《大同学》的文章,这是英国基德《社会进化》一书的节译。节译者李提摩太,撰文者蔡尔康。在《社会进化》第1章经过窜改的一节摘要中,译者写道:

合众小工而成一大力,往往停工多日,挟制富室。……似此举动,较之用兵鸣炮,尤为猛厉。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

文中把马克思之国籍弄错了。至于“马克思之言曰”一段文字,乃是对《共产党宣言》中“资产者与无产者”一节有关内容的意译。

同年4月,《万国公报》第123册连载之《大同学》中又有一节说:

今世之事,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马客缙(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美国之爵而

治(亨利·乔治),主于救贫者也;美洲又有柏辣弥(贝拉米),主于均富者也;英国之法便(费边),尤以能文著。皆言人隶法律之下,虽皆平等,人得操举官之权,亦皆平等,独至贫富,竟若天渊。

在这里,社会主义被译成“安民新学”。所谓“主于资本者也”,实指《资本论》。作者还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巨著“语语翔实,讲求政学家,至今终无以难之”。

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连载了日本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译文,其中介绍了马克思创办第一国际的历史,说:

麦克司(马克思)与拉沙米(拉萨尔)均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倡自由之说,而两党之势以炽。然而主义各不相同。麦克司始在可伦开设报馆,倡均贫富之说,后为政府所不容,窜于伦敦。今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各国工人之首领,均会集于伦敦,名曰万国工人总会。……麦克司自为参事会长,总理全体。

1902年至1903年出版了译自日文的《社会主义》、《近世之社会主义》、《近世社会主义评论》、《社会党》、《社会主义神髓》等介绍社会主义的著作。

《社会主义》,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著,罗大维译,1902年4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书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了系统介绍,特别介绍了剩余价值学说。同年,文明书局又出版了侯太馆的译本。

《近世之社会主义》,日本学者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1903年2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书以相当篇幅介绍马克思及其主义,并称马克思为“一代伟人”。

《近世社会主义评论》,日本久松义典著,杜士珍译,1903年2月至4月连载在上海《新世界学报》第2至第6期上。

《社会党》,日本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基督教徒西川光次郎著,周百高译,1903年3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书系介绍近世欧洲的社会主义,将其分为三派,即虚无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神髓》,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幸德秋水(1871—1911)著,中国达识社译,《浙江潮》编辑所1903年出版。该书分为7章,基本上依据《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书,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除此译本外,还有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社1906年出版的蜀魂(遥)的译本和东京奎文书局1907年出版的创生的译本。

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有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派介绍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有马君武、朱执信、廖仲恺诸人。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著文提到:“麦喀士(马克思),德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居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数之强者所压服。”他又说:“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述甚多。”“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



中国翻译通史 现代部分 第一卷

之特产物也。槩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掠夺多数人之土地劳力而组成之者也。”

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指出社会主义发源于圣西门、傅立叶,极盛于德人马克思。“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之人也。马克司尝谓:阶级斗争,为历史之钥。”并附有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贫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书目。

1905年11月,朱执信用“蜚伸”笔名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革命家小传》,全面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节译了《宣言》中的10项原则,还提及《资本论》。

1906年6月的《民报》上刊登了覃斋(宋教仁)编写的《万国社会大会史略》;8月份又刊登了渊实(廖仲恺)的译文《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和梦蝶生(叶夏声)的《无政府党和社会党之说明》,分别介绍了国际共运史,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区别。

日本东京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于1907年第13、14卷上发表了震述的《经济与女子革命》一文,以附录形式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2章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1908年1月,该报第15卷刊载了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同年2—5月,该报第16—19卷又发表了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第1章,还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章《家庭》的几段摘录。

1912年5—7月,上海《新世纪》半月刊第1、3、5、6、8期上刊载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第1、2节和第3节的一部分,译者是浙江余姚人施仁荣。

民国初年,还大量再版过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著述,如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柯卡普的《泰西民法志》等皆得以重印。

1919年有三位译者翻译了列宁的著作:

1919年9月1日出版的《解放与改造》(张东荪主编)半月刊创刊号上,载有金侣琴译的李宁的《鲍尔雪维克之要求与排斥》,译者在译文前撰有如下的短序:

此文原题为 *N. Lelievre Tells What Bolsiviki Want and What They Oppose*, 为 Crozier Long 氏译成英文。余以鲍尔雪维克之主张,具见于是,凡研究鲍尔雪维克及俄国国情者,均不可不读也。故将 Long 氏译文,译为汉文,以飨国人。至鲍尔雪维克一字,或译过激派,或译广义派,均不甚妥善,试从音译。

金侣琴还在该书刊第2卷第6期上发表了《建设中的苏维埃》,为列宁《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一文的节译。

1919年9月21日《星期评论》周刊第16期上发表了戴季陶译的《李宁的谈话》,有短序云:

俄国的现状,复杂异常,要想得一点可以作参考的材料,已经不容易得到。而且关于布尔色维克方面的记事,尤其难得,这是我们研究俄国现状上

最大困难。本篇所译,是诺威(挪威)政治家奔特福德氏与俄国布尔色维克政府领袖李宁氏会谈记事。9月7日的大阪每日新闻,从诺威诺格伯报转载的,虽是很简单的谈话,也多少可以作我们一点参考。

1919年12月15日出版的《新中国》月刊上发表郑振铎译的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后附《对于战争之解释》一文。《俄罗斯之政党》,今译作《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对于战争之解释》,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战争的决议》。郑氏还译过《李宁的宣言》等,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刊出。

根据以上材料,钟凤著文确定金侣琴是我国最早译列宁著作的人。金氏译文比戴季陶译文早20天刊出,比郑振铎所译早3个半月刊出。金侣琴何许人也?钟凤介绍:他就是金国宝(1894—1963),江苏吴江人。早年在复旦大学攻读经济。毕业后在吴江中学任英文教师。后留学美国,专攻统计学,获硕士学位。返国后曾在暨南大学、上海商学院、上海政法学院任教。他是国际统计学会会员。曾在银行界服务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大学任教,著有《统计学》等。

这一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在晚清西学东渐的两种文化碰撞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也悄然进入中国。其进入中国的最早渠道是英国,介绍者是传教士。其后,日本则成为输入的中转站。因为20世纪初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正蓬勃发展,众多的中国留学日本学生和旅日知识分子耳濡目染,无不受其影响,于是乎纷纷翻译日本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而且十分迅速,如《社会主义神髓》原书于1903年7月初版,两个月后中文译本便问世了。

二、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员比较复杂,其中有西方传教士,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和投机分子。传教士把社会主义学说当作“救贫”、“均富”的“安民新学”来介绍,实际上是作为他们宣传基督教救世说的一种补充。无政府主义者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却也赶时髦介绍一下《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同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和社会危机,故同情社会主义,意欲预防资本垄断与日后之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总之,以上人等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不真正理解,只是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各取所需而已。

三、此时期的译介者因未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故许多译述都是零碎的、片面的、肤浅的,有些译文并不十分确切。后者如广智书局出版的《社会主义》一书中引证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一段云:

我党信否?劳动者欲脱资本家之羁绊,斯劳动者不可不自战!而欲劳动者之自战者,为使与资本家阶级制度之特权,全废灭阶级制度,得万人均等之权利,负万人共有之义务是也。我党信否?劳动者为资本家生命之源泉,专有生产的机关。若生屈从,即生社会之穷困;若精神卑屈,即生政治的服从。我党信否?劳动者欲解经济的束缚,为最重大之目的,故为百般之政治的运

动,单在扶此目的。

现今的译文是这样的: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更有甚者,由于介绍者受其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限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往往产生误解,有的竟至于歪曲、攻击。

第2章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两大时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革命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据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从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以五四运动为起点。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产业工人在辛亥革命时约为60万,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已达到200余万,登上了政治舞台,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对于五四爱国运动的意义,运动参加者瞿秋白指出“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含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化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饿乡纪程》)。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抨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革命精神,五四运动以后,革命者便开始比较系统地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革命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20—40年代间形成了第一次译介马列著作的高潮。这个传播高潮是在压制、反抗和斗争中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传播高潮,则是由新政权促成的。因此,我们可以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分为这样两大时期:一、从1919年到1949年;二、从1949年到2000年。

一、从1919年到1949年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给中国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血液。五四前夕,国内宣传新文化思想的进步团体和出版物如雨后春笋。仅在五四后的一年,全国新出版的刊物就达400多种。这些刊物的思想倾向尽管不同,却都或多或少地介绍和宣传某种马克思主义思想。其中最突出的,首推《新青年》。

中国翻译通史
现代部分·第一卷

《新青年》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杂志之一。它的前身是1915年9月15日创刊、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从2卷1号起（1916年9月1日出版）改名《新青年》，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批判刊物。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著名文章，鲁迅又发表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从而使该刊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重要阵地。从1919年1月15日的6卷1号起，《新青年》改由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沈尹默、钱玄同、高一涵等人负责轮流编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把他当月主编的6卷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1920年5月1日，该刊的7卷6号又出了一期“劳动节纪念”专号，篇幅比平时长一倍以上。从1920年第8卷起，《新青年》改组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社址也由北京迁往上海。从8卷1号开始辟出“俄罗斯研究”专栏，转载了当时从西方和日本报刊上搜罗到的有关苏俄革命的理论 and 实际情况的材料，先后有译文35篇。其中震嬴译的有24篇，李汉俊译的有5篇，杨明斋、李达译的各有2篇，陈望道、张慰慈译的各有1篇。关于列宁著作的翻译，该刊在1920年11月1日的8卷3号上刊载了1919年3月19日列宁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的一部分，标题是《民族自决》（震嬴译）；同年12月1日的8卷4号上刊载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节译，系震嬴转译自纽约《苏俄》（*Soviet Russia*）周报，标题是《过渡时代的经济》。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新青年》便迁到广州，改作季刊，成为中共的理论刊物，由平民书社出版。到1924年12月，共出4期。以后又改成月刊，到1926年3月，共出5期。这9期中转载的列宁著作，有1921年成舍我译的《无产阶级政治》（即《路易·勃朗主义》），李达节译的《列宁底妇女解放论》（系节译《伟大的创举》）；1923年译的《俄罗斯革命之五年》（系节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第2篇）；1924年弼时译的《中国战争》（即《中国的战争》），仲武译的《革命后的中国》（即《新生的中国》）、《亚洲的醒悟》（即《亚洲的觉醒》）和《落后的欧洲及先进的亚洲》；1925年郑超麟译的《专政问题的历史观》（即《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和《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位置》（即《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陈乔年译的《社会主义国际的地位和责任》等。

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的《每周评论》，在第16期（1919年4月6日）上的“名著”栏中曾登载过舍译的《共产党宣言》第2章关于十大纲领部分。

1919年1月1日在北京出版的《国民》杂志，于五四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如在其第2卷1号（1919年11月）上摘译了《共产党宣言》，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李泽彰译；在第2卷3号（1920年8月）上刊载了费觉天译的《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和常乃庸译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系摘译《致瓦·博尔吉乌斯》）。

1919年在北京，《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期刊载了金侣琴译述的列宁《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题为《鲍尔雪维克之要求与排斥》；《新中国》第1卷第8期上有郑振铎节译的列宁《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题为《俄罗斯之政党》。

在上海，《东方杂志》于1921年1月第18卷第1期刊载了范寿康摘译的马克思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篇·第2章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
两大时期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题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1924年3月第21卷第5期上又刊载了诵虞译的列宁《论合作社》，题为《合作事业与新经济政策》。

五四运动后在北京出版的青年学生刊物之一《曙光》也曾大量刊登过翻译文章，其内容产生质变是在出到1卷6号之后。该刊到1921年终刊，共登出23篇介绍苏俄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对列宁在1919和1920年所写的一些著作的译介，如1920年11月第1卷第6期登过王统照译的列宁《旧治更新》（即《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同年11月第2卷第1期由WRK节译了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题为《过渡时代之经济》。

1919年2月，《晨报》副刊改组，由李大钊参加编辑工作，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从1919年5月5日起，到同年11月11日止，共存在了6个月。该刊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食力译的马克思《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渊泉译的考茨基《马氏资本论释义》（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及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到1920年，该刊转变了政治态度。但在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期间（1921年10月至1924年10月）也还出过“马克思纪念”专号（1922年5月5日）和“俄国革命纪念”专号（1922年11月7日），并于1922年2月15—20日，3月20—30日连载过象予译的列宁《劳农俄国底建设事业》（即《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同年1至3月还连载过荷共创始人之一班纳哥克所著的《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全译文。该书比较正确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关系。

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从1919年5月到年底，除转载《晨报》副刊所载的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外，还刊登过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党泰斗马格斯之学说》、《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等文章。《学灯》乃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之一，是研究系成员主办的。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会旗帜鲜明，公开宣称本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作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派学说和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该会自发起时仅十几人到后来发展到包括广州、郑州工人在内的二三百人。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有关书籍匮乏的困难，他们集资建立了一个名为“亢慕尼斋”的图书馆，经过大家努力，很快搜集到中外文马恩原著单行本及有关书刊百余种。在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方面，罗章龙回忆说：“研究会成立了一个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个翻译组。”“我们德文组曾译过《共产党宣言》，是从德文翻译的，有油印本。”“我还记得《共产党宣言》很难译。如《宣言》的第一句话，有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大家议论，‘幽灵’两个字不大好，但又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有的同志说，直译，然后把意思作个说明。在那时我们认为‘幽灵’在汉语中是个贬义词。在德文，‘幽灵’这个词就是‘鬼怪’的意思。我们还认为‘徘徊’这个词也不好，因为没有指出方向，所以后来我们加以说明：‘欧洲那时有一股思潮，像洪水在欧洲泛滥，这就是共产主义。’类似这样的说明，在译文中约有七八处之多。《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部分译文曾被《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引用过。我们德文组还译过《资本论》第一卷，这是李大钊先生号召我们翻译的。”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现当代部分·第一卷

1920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了理论刊物《共产党》。该月刊共出6期,由李达主编,着重宣传共产党的知识,大量介绍有关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同时介绍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学说。重要的文章,有第1期上震嬴译的列宁《俄罗斯的新问题》(系摘译《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党纲的报告》),第4期上P生(沈雁冰)译的列宁《国家与革命》(系节译其第1章),第6期上朗生译的《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的世界联盟——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的宣言》等。该刊还特设“世界消息”栏,大量介绍共产主义运动在各国迅猛发展的情况,报道德、英、法、美、波兰、捷克、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日本、葡萄牙、丹麦和希腊等国建立和正在组建共产党的消息,以及许多国家工人运动和罢工斗争的情况。

1921年2月,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了《今日》月刊,在其第1卷2、3、4号上由卞摩汉编译了《绝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和《绝对的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系摘译自《资本论》第1卷第3、4、5篇;该刊第1卷第4号上又有熊得山译的马克思《哥达纲领批评》;第3卷第2号上又有熊得山节译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5、6、9章的3篇文章,即《历史以前底文化阶段》、《国家的起源》和《未开与文明》。

1921年7月,刚建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因为是秘密出版书刊,故将地址写成广州昌兴马路,负责人李达。它的宗旨和任务,在《新青年》第9卷第5期刊登的广告中有所说明:

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的迅速,一面为信仰不坚祛除根本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国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的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

广告上还说,该社拟出版三套丛书,即“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明尼斯特丛书”11种,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反动势力统治下的环境与条件的限制,一年内经过努力,实际上仅出版了16种书。其中“马克思全书”出3种,即《共产党宣言》(是重印陈望道1920年的译本,译者署名改为陈佛突)、《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是袁让根据恩格斯校订的1841年德译本翻译的)和《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汉俊从日文翻译的马尔西著的通俗小册子);“列宁全书”出版5种,除《列宁传》外,其他4种均是列宁的著作,即《劳农会之建设》(即《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李立即李达译)、《讨论进行计划书》(包括《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和《论策略书》,成则人即沈泽民译)、《共产党礼拜六》(即《伟大的创举》,王静译)和《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即《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李墨耕译);“康明尼斯特丛书”出版了4种,即《共产党底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和《第三国际案及宣言》。其他编著出版的有《李卜克内西纪念》、《两个工人谈话》、《俄国革命纪实》、《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等4种。人民出版社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我国出版史上它却是第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出版马、恩、列著作的机

构,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1923年,人民出版社与新青年社合并而成为上海书店。不久又在广州设立平民书社(1923—1927)。上海书店在1924—1925年间办得很出色,由崇文堂印书局印刷出版了30多种书籍,如张秋人译的《将来之妇女》(M. S. Lilienthal 著,中国青年社丛书第一种)、施有亮译的《资本主义制度浅谈》,张伯简译的《各时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等。该书店的出版物在推动“五卅”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1926年2月,军阀孙传芳借口该书店“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碍治安”,对之进行迫害。到1926年秋冬之际,书店终于遭到封闭。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工作从此转入地下。

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人与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知名人士共15人(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沈雁冰、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周建人、夏丏尊、经亨颐等)共同创办了“新时代丛书社”,通讯处为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108号(现兴业路76号)。这里原为李汉俊及其兄李书城的寓所,也是中共召开“一大”的会址。《新时代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到1923年12月,共出书9种。其中中共早期党员的译著有5种,即李达译日本堺利彦著的《女性中心说》,施存统译的《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与日本高畠素之著的《马克思学说概要》,李达译日本安部矶雄著的《产业制限论》和沈泽民译瑞典爱伦凯著的《儿童的教育》(其他4种是夏丏尊和李继桢合译的日本高畠素之著《社会主义进化论》,祁森焕译的日本山川菊荣著《妇人与社会主义》,周建人译的英国唐凯司徒著《遗传论》和太朴译的英国麦开柏著《进化》(《从星云到人类》))。这套丛书的封面采用与《新青年》杂志封面同样的装帧,暗示丛书与《新青年》在思想上一致。商务印书馆本身则于1922年10月出版了李季译、陶孟和校的马克思《价值价格及利润》(即《工资、价格和利润》)一书。

还值得一提的是长江书店。该书店于1926年11月间成立于武汉,同时还设立了长江印刷所,由瞿秋白领导。长江书店除继续发行上海书店(包括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外,还发行其他进步书店进步书刊。1927年2月,北伐军占领杭州、嘉兴,直逼上海、南京,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迫切需要革命书刊。因此,中共决定在上海恢复公开的出版发行机构,于是成立了《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杂志的总发行所,后改名为上海长江书店。时隔不久,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这家新成立的书店便遭扼杀。其后,汪精卫、唐生智也发动了“七一五”叛变,汉口的长江书店亦遭封闭。当时,瞿秋白翻译的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即《论列宁主义基础》)在上海不能发行,于是交英商轮船运往汉口。途中被人告密,不得不把船上一万册的书包沉入江中。汉口长江书店乃重印此书,并在封面上印有“新青年社丛书之一”字样。

中共中央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评论刊物《向导》是1922年9月13日问世的。该刊由蔡和森主编,高君宇任编辑,社址在上海老西门肇滨路兰发里3号。1923年3月底,瞿秋白到达上海,参加《向导》的编辑工作。1925年6月,蔡和森因病辞职,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兼任主编,郑超麟负责日常事务。1927年初,《向导》迁至武汉。同年7月18日停刊,共出201期。《向导》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特点,是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不断深入探讨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公开申明中国共产